

意义与价值世界中的“两型社会”建设^{*}

黄志斌 刘晓峰

[内容提要]“两型社会”是在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建立的、可以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一种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在观念层面上必须实现由“浅绿色”资源环境观念向“深绿色”环境观念的深化;在实践层面上必须实现由资源环境“收益趋小型”思维向资源环境“收益扩张型”思维的转变。

[关键词]“两型社会” 资源 环境 生态文明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3-0069-04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理念。在我国,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200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两个“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模式,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遭遇生存与发展危机的理性自觉,体现了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和价值追求。对于“两型社会”的研究,以往学者多触及具象性的实证研究,鲜有研究从意义与价值的视野透视“两型社会”建设,本文试图通过“两型社会”意义与价值世界的构建,增强人们践行“两型社会”建设的理性自觉和行为自律。

一、自然生态的本然价值理解与“两型社会”建设的价值基础

在人类还没有诞生之前,自然已先然存在,那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因为缺失“主体”,所以世俗的价值意义判断不存在。而当人类作为“主体”在自然孕育下产生后,便开始了对自然价值意义的理解与评说。从意义与价值的视角来看,

这一过程经历了朴素经验阶段、科学实证阶段和形上思辨阶段。

对于自然价值的朴素经验性的理解主要不是通过理论性的论证或反思而确立,而更多地是采取不证自明、自发认同的方式,其接受的过程以生活实践与生活影响为基本前提。远古时代,人类的自我意识尚处感性懵懂状态,人存在的意义自在性高于能动性,所以“原始人”没有真正地将人类自身同自然界区分开来,只是本能地将自己的存在渗透融合于天地之中,形成了非自觉状态的人类与自然的平等交往和人类对自然道德意义上的敬畏、尊重,甚至是崇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①

科学实证阶段实现了对朴素经验阶段的否定,这一阶段到近代取得了较为成熟的形态,主要以实验手段和数学方法来把握自然的价值意义。在与自然的唇齿相依中,人类由自在走向自为,由感性走向理性(工具理性),这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意识到了自身与自然客体的区别和差异,标志着人类“类”特征(主观能动性)的觉醒;另一方面,工具与技术理性的“非理性”理解和运用,使得人类在自然面前滋长出了无限的优越性和自豪感,人类成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成为唯一拥有存在价值和权利,并且是唯一应当享受伦理关怀的高等动物,自然则只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西部地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08&ZD043)和安徽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生态文明与安徽中小企业生态化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HSK07-08D132)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其著名命题：“人是目的”，“人为自然界立法”；英国大哲学家洛克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从这些哲人的经典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伴随客体尺度的虚无消解，主体尺度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在此种“理性”主导下的文明历程指向的只是人类自身，而对自然却是非文明的虐虐和劫难。当然应该看到，人类自我理性与自我能力的肯定也确实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它使人类享有了空前的富足与繁荣。然而这种胜利是局部和短命的，“反自然”的价值行为首先带来了自然价值的戕害，而这种后果也正在贻害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其次，还促成了人的发展畸形化，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它使人的视点聚焦于物质享乐而成了物的奴隶，从而忽视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人类后代繁衍生息的长期性要求。

形上思辨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螺旋式上升和回归，它关注的不再是存在的具体领域或单个的“类”，而更多地体现出对整体世界的思考和把握。工具理性的蔓延造成了种种自然问题情境，在这种情形下，人类的人文理性觉醒滋长，开始思索人类之外的其他东西是否具有自身内在的意义和价值，并逐渐认识到自然界是“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具有先在性的“优先地位”及独立存在的“尊严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②在这里，马克思显然认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有天赋、才能和欲望的存在物，这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的不同之处，但是人的理性再深邃、精神意志再坚定、能动作用再伟大，都是第二性的，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而自然界对人来说具有先在性，是不依赖于人、存在于人之外的“先在”。所以，人类在地球上不应该是“先在”的统治者，生态系统中的每一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每一种生物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此点无关乎人类的需要和用途；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纳入道德关系的范围中，确认它们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

“两型社会”是在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建立的、可以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一种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符合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使用，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显然，“两型社会”建设是对自然生态内在意义与价值的实践肯定。其一，“两型社会”建设从更完整的意义上重新诠释了“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过程不仅仅表征了人类日益提高的物质能力和所获得的物质丰裕度；更关键的是，在价值视阈，“两型社会”建设将自然“人化”的过程突破性地理解为人类更深入地进入自然、融入自然、依赖自然的过程，而非脱离自然，与自然渐行渐远的过程。其二，“两型社会”建设强调、彰显了人类的“系统价值”是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在与环境、与他物的交互作用中以其主体性特质促成物与环境的价值由内在向现实的转变，同时又以其社会性特质使自然价值递增转变为社会的价值。以此看来，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必须以潜在自然价值为条件，未来人类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基础在于自然价值的增殖，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严重破坏了自然价值，就构成了对人类价值产生源头的摧毁，这种创造在总体上不是“善”的创造，而是“恶”的创造。总之，“两型社会”建设对于资源和环境的“责任”凸现了其整体性思维特质以及对地球物质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道德关怀，彰显了其价值“善”的本真。

二、资源环境的实然危机与“两型社会”建设的价值内蕴

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当代人迅速获得了其前辈从未有过的物质享受，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个生态失衡、冲突动荡的地球环境。1987—2007年的20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34%，人均年收入增长了40%，但是地球的生态总承载力却超支了1/3，可谓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趋恶化。从地球的整体资源状况看，呈现出四大危机：水资源危机、土地资源危机、森林锐减与物种灭绝、能源危机。英国著名的生态学家爱德华把全球的环境危机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侵略战争”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全新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另一种是人类对眼前的生存危机熟视无睹，继续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的环境，最终只能是自掘坟墓，自我毁灭。所以，“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人类挽自己于狂澜的唯

一正确选择,而这道德、情感的变革和转换之于社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将是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

首先,“两型社会”建设对于资源环境的道德关怀和情感渗透,是人类提升与实现自我意义与价值的前提。自然界既具有外在价值又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外在价值,是指自然界对人和其他生命具有的有用性,即它作为他物的生存手段或工具是有价值的;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即自然界作为生命共同体在宇宙环境中,是自我维持的独立系统,有自己的内容和规律。自然界外在价值的保持以其内在价值的完整作为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自然的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具有优先性,一旦生态价值遭受破坏,人类价值也便荡然无存。所以,马克思形象地把自然比喻为人的“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之外的“无机身体”,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意义与价值要得以实现,就必须通过劳动与自然之间发生物质代谢,而要保持这种代谢长期持续地正常进行,必要条件应当是人与自然“两个身体”都是健康的。“两型社会”建设旨在克服人类“反自然”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在将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类更深入地融入自然,实现“两个身体”的有机统一。

其次,“两型社会”建设对资源环境的道德关怀和情感渗透意寓着人类人文理性的扩展与提升,遏制由于工具理性的盛行而导致人类自身的加速异化。“异化”本来是指发生在主体身上的一种现象,即主体活动的创造物脱离主体的控制,反过来成为凌驾于主体之上的、支配主体的异己力量。事实上,人类当下的许多行为正在大大加剧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的产生。由于工具理性对技术实用、物欲占有的强调,使得人类生存的另一维度,即体现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之非功利、非实用、非技术性的精神灵魂方面受到严重忽视和排斥,人类日益丢失其“高等”属性,变成非精神性、非灵动性的动物,变得对人的非物质方面、人的本质、生命以及世界终极意义等形而上问题缺乏兴趣和关注。长此以往,人类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就会以一种机械、世俗、实用的思维方式去审视周围的一切东西,人会因此变得单调、枯燥、乏味、僵化,人类世界将面临“意义”危机。不仅如此,人类无节制的物质活动,使自然界的外在

限度日益凸显,同时这种活动给人类所带来的舒适感也日益降低着人的“内部极限”,麻木肢解着人类自身的“有机身体”感觉。“两型社会”建设表面上看是人类遭遇“自然的反抗”后的选择,这里面多少有点无奈的成分,事实上,在许多哲人看来,它“意味着人性的反抗,它是以长久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暴力反抗形式发生的”^③。因为工具理性已经使人成了自己控制自然而制造的工具的奴隶,使人日益丢失着人的本质,所以“两型社会”建设在取得外部自然和谐的同时,最终收获的是人类对于人“内部自然”的修复和提升,重拾人的“类”本质特征。

再次,“两型社会”建设赋予资源环境的道德关怀和情感渗透是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的一把钥匙。贝切伊在《未来的一百页》一书中指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控制的人口增长,各国人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和分隔,社会的不公正、饥饿和营养不良、贫困、失业、拼命追求物质增长、货币贬值、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民主危机……自然系统的破坏、环境退化、道德标准下降、失去信心、不稳定感等等。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自身的变化,但它们往往都相互影响。”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构成了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环境问题表面上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进一步说,它更是被人与人的环境利益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左右,是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不恰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模式与制度的产物。“两型社会”建设正是力图抓住资源环境问题,以此为突破形成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将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下,从而最终破解“世界问题复合体”。所以说,“两型社会”建设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需要经济、政治、文化、伦理、技术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与创新,只有通过诸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才能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大和谐。

三、“两型社会”建设的应然价值路径选择

资源环境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大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两型社会”建设是人类在“知一行”多维较量、整合后的明智选择,而人类最终能否籍此走出资源环境问题这片沼泽,价值路径的选择最为关键。

首先,在价值层面,我们必须以系统范式考量

“两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载荷。具体地说,“两型社会”的建设至少具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生态价值的收获是最直接的,减量使用资源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控制污染排放并采用循环模式,可以使生态有机体重回其再生能力范围,使自然与人类重获和解,不给后代人留下一个赤字的生态环境;同时,“两型社会”建设的生态价值中还蕴藏着“类价值”因子,它将为人类寻找、合成维系自己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物质与能量方面赢得宝贵的时间。“两型社会”建设经济价值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量的孕育。1972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自然界的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它在给世人以极大的警示的同时,也似乎设定了一个“死局”,即经济与生态的对立,从而引起了学界、商界的极大争议。近些年来,更多的学者赞成,从本原意义上讲,只要人类趋于“公正、平等、理性”地对待自然,两者之间并非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即只要人类能够厘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以前瞻的眼光推动生态新产业的形成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就一定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收获丰厚的经济回报。“两型社会”建设的人文价值较之生态与经济价值似乎间接了许多,但它对人类“类”本质的复活和完善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两型社会”建设从长远看能够多维度地促使人本身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够不断改善人的衣食住行,生态和谐能够增强人类“类”存在的安全性和当代人的生活品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使人逐步摆脱工业文明制造的“单向度”性,不断进化为完整的人。总之,全面考量“两型社会”建设的价值载荷,能够敦促当代人形成整体性思维,以系统和“全球化”的眼光来考量和解决当前的资源环境问题,避免实践的短视和偏颇,并以此增加人们对“两型社会”建设的动力和信心。

其次,“两型社会”建设在观念层面必须实现由“浅绿色”资源环境观念向“深绿色”环境观念的深化。同济大学的诸大建教授在编撰绿色前沿译丛的总序中阐述了“浅绿色”资源环境概念与“深绿色”资源环境概念的差异,“浅绿色”观念建立在资源环境与发展分裂的基础上,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而“深绿色”的观念则要求将资源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这是90年代以来第二次环境运动的主题。两者的区别在于:“浅绿色”观念较多地关注对各种资

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负面影响,“深绿色”观念则重在探究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在此基础上的解决途径;“浅绿色”观念常常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深绿色”观念则要弘扬环境与发展双赢的积极态度;“浅绿色”观念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深绿色”观念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浅绿色”观念主张以经济的零增长遏止生态恶化,维系生态平衡的思维显然是被动的,它以牺牲当代人利益来维系未来人利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落入空想。“深绿色”观念追求的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它的一个突破是厘清了经济与生态的本末关系、依存关系。

再次,“两型社会”建设在实践层面必须实现由资源环境“收益趋小型”思维向资源环境“收益扩张型”思维的转变。关于资源节约与环境投入,传统的观点是“收益趋小型”,即一个个体或组织资源节约与环境投入的量越大,其耗用的成本就越高,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弱。当前,在资源环境问题上,社会和政府赋予个体或组织的大多是制度制约和政策支持,一般不会为它们的资源环境问题提供直接的科技支持和设备资助;在生产运作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外携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生态行为极有可能造成个体或组织“入不敷出”的窘境,即它们为资源环境所付出的要比它收获的大,呈现“收益趋小型”。长此以往,这些组织或企业对于资源节约的兴趣自然不大,甚至是排斥的。

对待资源环境问题在操作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分析,以经济的方式求得生态的利益,在经济学层面变“收益趋小型”为“收益扩张型”,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资源环境行为的自觉性。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个体与组织认同资源环境“收益扩张型”的观点。实现“收益扩张型”,就要从思维的角度学会“全方位思维”,从理念的源头、从技术的根本上寻找提高资源生产率的路径。同过去“外携式”的资源环境行为相比,这种“内源性”的生态行为收益更大、更持久,即呈现“收益扩张型”。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1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③ [美]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吕楠]